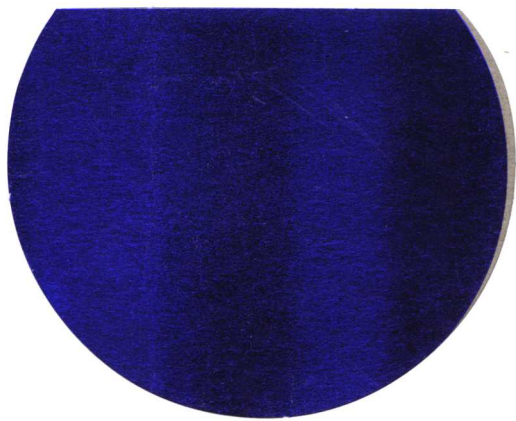


新哲学学院丛书



责任的落寞

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

Le crépuscule du devoir
L'éthique indolore des
nouveaux temps démocratiques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著

倪复生 方仁杰

◎译

责任的落寞

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

Le crépuscule du devoir
L'éthique indolore des
nouveaux temps démocratiques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著

倪复生 方仁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法]利波维茨基著;倪复生,方仁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新哲学学院丛书)

ISBN 978-7-300-07988-2

I. 责…

II. ①利…②倪…③方…

III. 伦理学—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4129 号



新哲学学院丛书

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著

倪复生 方仁杰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编辑热线:010-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3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0.75 插页 4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0 000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导 言

在千禧年相交之际,只有一个词抑或称之为一种理念,能让芸芸众生侧目,能让西方民主之魂复归躁动,那就是伦理。十几年来,伦理从未停止扩张的步伐,它浸染着媒体,触发了对哲学、司法以及职业道德的反思,拷问着新兴的群体行为、欲念以及现存的制度。生物伦理,舆论支持,人道援助,环境保护,商业、政治和媒体领域的道德化运动,有关堕胎、性骚扰、色情网站的争论,“正确的”语言使用规范,禁毒、禁烟运动等,处处可见责任感与价值观的复苏,似乎这复苏是当代的头等大事。伦理界更是成了一面特殊的镜子,新的时代精神尽显其中。我们的社会由于受到了个人与集体自由思想的涤荡,道德被视为一种虚伪或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压迫。曾有这样一句话:当伦理复为人们所称颂时,一个只信奉效率、变通、成功以及道德庇护的新文化便应运而生,因此,道德并不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21 世纪有可能就是一个伦理的世纪”。

与此同时,在绵延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某种警世的论调,如价值观的崩溃、个人主义的玩世不恭和“道德的末日”等会时常出现。摇摆于两极之间的现代社会孕育出了两种

对立的观点，一是鼓噪道德正在复苏，其二则是惊呼道德已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聚居区里的暴力、毒品和文盲成灾，贫困人口增加，不法金融行为泛滥和政治、经济领域内的腐败横行，等等。无疑在这两者之间不乏联系，我们可以将伦理之争的鹊起视做对这些颓废行为的一种应激反应，是面对越发严重的个人责任感缺乏所作的一种良知的回归。答案并非总能澄清问题的本质，如果说个人主义自为的以及自私自利的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又如何解释一种对于道德的群体性渴盼呢？一些人只顾及自己而无视他人及公共财物，然而为何他们却依旧能够“愤怒”，能够慷慨，能够知晓自己对于伦理的需求呢？以自我标榜为特征的个人主义文化反过来却把正直、团结和责任等这类高尚的东西放在了首位，这是为何呢？应当承认，来自大众的关注让今日的伦理获益匪浅，那些将个人主义与不道德完全混为一谈的论调也由此被纠正了，但同时却也使得已经没有了道德疑虑的，且界定颇为笼统的新个人主义变得复杂起来。

道德复苏或者说“道德秩序”赢得了赞誉，若进一步而言，这种复苏的确切本质又是什么呢？从何谈起呢？这些问题便形成了本书的核心。首先，我们来揭穿那看似真实的伪命题——“复归”。伦理在被冷落了一段时间后便不再被捧得高高在上，其复苏的模式让人认为它是一种无差别的再现。但严格地说来，道德功能的历史偏差是最具有

意义的,即价值观的社会介入的差异。当今时代不可能恢复“以往的好风尚”了,因为它已经逝去,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此便可以守原则或创造了某种新的道德价值观,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千百年来,它们还是它们。漫长的历程并不妨碍道德以新的方式来诠释价值观,新的道德社会调节功能由此得以发挥到了极致,而现代伦理史的新阶段也借此得以展开。近看生机勃勃,远观则可见一个重大的文化颠覆,这种颠覆的目的便是以人文主义为参照系,构建所谓“第三类型”的伦理观,即一种既不遵循传统的宗教道德模式,又不按照现代世俗的、绝对而严格的责任道德模式而建立起来的伦理观。

人们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唯一愿景便是能赋予处在历史新阶段的道德生活以意义,使其鲜明且突出。但纵览其整体的发展态势,结果又如何呢?自启蒙时代起,现代社会一直企图建立一种独立于宗教教义之外的道德规范,即不必仰仗启示,也不必受制于上天的赏罚。有资料表明,现代伦理世俗化大潮的第一波就是在 1700 年至 1950 年间的这种反宗教的抗争中酝酿而成的,其特征是:自宗教意识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借鉴宗教意识的一个精髓,即无尽的义务和绝对的责任。时兴的民主个人主义到处鼓噪并宣扬的便是这种道德约束,尤为关注人与公民的责任,并给私人生活强加了诸多的清规戒律。搬出责任这杆大旗为的是遏制现代个人权利的膨胀,为的是灵魂与肉体的重生,为的

是灌输纪律思想和自主意识,也为的是民族团结所依靠的、也是世俗社会所必需的一种道德的同一。随之而来的便是追求伦理理念的至真至纯,突显对世俗伦理的推崇,在家族、国家和历史的祭坛上颂扬自我牺牲的义举等,由此看来,现代人并非在与那种否定自我的传统伦理相决裂,而是在重构一种具有无限强制性责任的宗教道德模式。对上帝尽责仅是针对俗人而言,那些应履行的对上帝的义务已经蜕变成为了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群体的一种无条件的责任。伦理世俗化之初始阶段的伦理就如同是一种世俗界有关责任问题的宗教。

这一阶段之后,从逻辑上讲,一个新的道德世俗化时期便到来了。该阶段已不仅满足于证明伦理是独立于启示宗教的伦理,而且还要打破伦理其宗教般的社会表现形式,即打破责任这一命题本身。民主社会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迅速跨越了所谓伦理世俗化的“第二个门槛”,用让·博贝罗(Jean Baubérot)在其有关时期划分和命题判断论述中的话来说,就是后责任时代。这种伦理文化中的不平凡之处便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对神圣的戒律加以矫饰或废除而非颂扬,第一次对克己的思想加以平抑,与此同时,也对人们现时的欲望、自我意识的萌动以及人们对物质与精神享受的追求给予了鼓励。我们社会对那种提倡自我牺牲的价值观进行了清算,无论这些价值观是出自世俗目的还是源自其他方面的要求。日常言行不再因循那些夸张的责任说教,

它们只是一些追求快乐以及行使自主权利的行为。我们不再承认自己对别的事情负责,我们只对自己负责。至此可以看出,与宗教相比,道德是处在自发的地位,理论上讲它是建立起来了,但却是建立在某些“否定”之上,并通过其现实的功能而得以体现,即履行责任绝不可讨价还价。这种分化的结果便是伦理在不触及责任形式的情况下形成了,并在这种极端状态下,伦理也完成了其“脱离宗教”的过程(马赛尔·戈谢[Marcel Gauchet]语)。民主主义分子突然之间便超越了责任,并标榜其并非“无法无天”,他们还是要依据某些微不足道的伦理约束来行事的,这便是所谓的“不受约束也不受惩罚”;由此,时代的步伐催生出了一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后道德社会。

“后”系的概念已经很多,但在某个带有“后”字的典型理念出现之际,一些人仍难免会流露出迷茫。一种文化,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以外,它便不再教导人们“应当如何”,而更多的则是宣扬享乐的标准而非理念的约束,它把善举看做作秀和企业公关,那么,如何来称谓这样一种文化呢?个体权利的提升要以责任感的尽失为代价,伦理标记虽到处可见,但自我牺牲与奉献却无迹可寻了,又如何来界定这样的一种文化呢?我们见到的后道德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不再颂扬摩尼教完善的清规戒律,却转而对享乐、情欲和自由大加赞誉;它发自内心地不再接受最高纲领主义的预言,只相信伦理界的无痛原则。这亦即为何伦理主旨

的复苏与后道德主义逻辑之间并无矛盾之故，人们愿望中的伦理应是不要要求作出较大的奉献，但也不能接受自己受损，人们无须费心去做英雄的壮举，而只须在灵魂与狂欢、美德与利益、迫切的未来与安乐的现时之间做好调整。伦理与后道德时代的个人主义不可能发生正面冲突，伦理的效用其实就是后道德社会的晴雨表。

后道德主义的逻辑虽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并不排斥其对立面的存在，因为不同的国家对道德公开的需求强度也有所不同。在后责任时代，我们既看到了由堕胎问题引发的强烈抗议，也同样见证了人们对偷越边境、生活放荡以及色情业的颇多责难。由此，后责任时代并不是一个宽容放纵的社会的同义词，它所谋求的仅是扩大个人的权利，这便是后责任时代真实的写照。消除了责任膜拜的社会也将绝对主义精神置于了荒凉境地，它既不取缔“原教旨主义的”运动，也不阻止超高压的或德行的立法建议成为法律（如涉及毒品、死刑、堕胎、新闻审查制度、卫生极端主义等）。人们也许注意到这样一种态势，即虽然有一些外围运动的鼓噪，但道德热仍逐渐地在降温；再者，责任外的文化非但没有平息有关伦理的争议，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促进了大众的参与，加深了各观点之间的对立。在争论中得以凸现的并不是对立面之间的缓和，个体权利也并未由此而不可遏制地膨胀，反而是两种对立的事关价值观的思维方式，即两种用来调节个人主义社会矛盾的模式同时得到

了极大的发展,尽管这二者所涉及的社会广度是极不均衡的。在这两种思维方式中,一方是一种松散的且可商榷的逻辑,它自在而实用,钟情于循序渐进式的架构,整合杂乱的标准,明确达标的依据,划定特例和特许的范围;而另一方则是摩尼教的教义,一种严谨的善恶二元论逻辑,依据的是教义上的而不是现实中的诸多论据,倡导遵循戒规,无视人文进步,侧重于压制而非预防。折向民主主义的趋势有助于找到折中的解决办法,但与之相左的对立方也会借机自抬身价。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并不排除会使用一些可令原教旨主义理念都相形见绌的过激手段来进行调整。由此,一种受到了一小撮极端主义激进分子蛊惑、同时也被有关安全、健康、妇女儿童保护等热点问题所左右的新道德保守主义上台了。这不能说是一种严厉的道德,至少也是对于责任的一种狂热。明天的状况部分表现于今日的争论之中,这场争论是由两种对立的逻辑而起,其一是远离了极端主义的逻辑,它兼顾到了社会以及个体的实际状况的复杂性,制定了一些多元的、实证的以及个性化的举措;其二是以探询新的伦理教义和法律形式为借口,从而得以从社会及个人现实中摆脱开来的逻辑。无须多言,责任之终结并非意味着“历史之终结”。

虽然把后责任等同于道德意识的崩溃的确有些过分,但也应当承认,后责任在自控及社会约束机制的解体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个人主义在社会各个层面肆意妄

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实便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例如,职业上的及社会的排斥已成为了社会架构的基础,日渐庞大的聚居区可见越来越多的无父家庭、文盲和团伙帮派,而这些又导致了卫生状况的恶化、毒品泛滥以及青少年暴力、强奸、谋杀案的增加,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可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可归因于传统的社会约束机构(教会、工会、家庭、学校)的没落,归因于一种只顾眼前的文化,一种颂扬自我意识、自由与及时享乐的文化。后责任时代尽其所能地肢解并分化了民主主义,在混乱与恢复的过程中,造就了大量的融入与排斥,大量的自我养护与自我损毁,更多的对暴力的恐惧、对堕落的熟视无睹,更多的“蚕式生活”及更多的无家可归者。个人主义以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到处招摇;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有驾驭力的且是可变通的;但对于不幸的少数人而言,它则是“不可理喻的”、癫狂的和无前途的。

一些现象也说明了责任外文化的离散倾向,如这边是盗窃和财物侵占案件的不断增加、投机的盛行以及腐败与金融诈骗的猖獗,而那边却是对一些道德化、地球未来、劳动以及职业价值观等举措举行公民投票表决;这边是拜金主义与竞争热,那边则是慈善捐助与全民义务劳动;这边是自我保健养护与退休储蓄规划,那边是家庭超负债、酗酒以及导致毒物癖的药物滥用等。责任说教终结之后,整个道德体系并不是轰然倒塌,而是呈现出一个无序的发展与有

序的伦理重组相并列的局面,该局面的依据就是个人主义规范其本身,因而可以认为,后道德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的混乱”。

民主主义的两极分化并不单单意味着复归蛮荒,意味着不稳定化和社会边缘化,它还突显出两种反义的个人主义逻辑:一种是关注道德准则、关注公平和未来的个人主义,另一种则是各人顾各人、“身后之事与我何干”的个人主义;或者用伦理学术语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和一种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受困于责任感问题的社会是不会出现疯子马克斯^①的,即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势力是不会彻底声讨犬儒主义和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这并不是哗众取宠,现代伦理的迅猛发展已说明了这一点。个人主义结构性的矛盾并非普遍存在的不检点行为,而是在逻辑上同时并存的有序与无序、均衡与调节,这种矛盾预示着民主主义的未来:压制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重塑政治、经济、社会、企业、学校的环境以促进负责任个人主义的发展,一切并非难事。

为了朝着这个方面发展,新时代要求我们不再预设任何想当然的总模式。于是,“无形之手”使诚信尽失,末世说的理论使信仰消散无踪,国家救赎论也淡出了视线。连我们高尚的责任感也不再是必需的了。由此可见伦理成功的

① Mad Max 是一部美国影片的主人公,他疾恶如仇,惩治邪恶毫不手软。——译注

缘由之一：在伟大的思想者们不再迎合时代的鼓噪时，伦理便恢复常态。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向伦理的转向为民主主义提供了机遇，它证实了我们日渐增长的对于未来责任的认识，证明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得到了巩固加强。那种将今日的伦理看似灵丹妙药、又似修辞学中语句重复的比拟，明显有些过于盲从与狂热了，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幻想并没有随“世俗宗教”的崩溃而被埋葬，而是重新寄附在“伦理主义”身上，亦即幻灭后的“伪良知”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经历了对历史与革命的崇拜之后，玄奥莫测的良知的新变种——伦理崇拜出现了。对未来的把握实际上取决于宽容以及心智突破性的发展，但如何能使人相信这些呢？伦理委员会仅凭借几句理想化的宣言和几声正大光明的抗议就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吗？伦理的不幸在于其自身是一个花架子，而并非能够改变贪婪与邪恶的个人主义以及科技时代的一个工具。人们享用着电子辅助设备，击掌称赞伦理宪章、管理委员会与人道援助：妙啊！但人们仍怀疑这些举措能否解决社会边缘化、劳工矛盾、民主社会公民权遭到削弱等问题。那么，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结果又会如何呢？干涉虽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称颂的，但它却无法应对经济欠发达、专制和大屠杀等问题。这只是一种唯意志主义的新政治，一类精致的组织，一个使所有人都能适应飞速变化的培训体系而已，而不是我们所需的那种“灵魂的补充”。万能的伦理有其局限性，它可形成严重的障碍，甚至会引发

逆反的后果,对此仍需人们加以正视,故而,当眼前出现了一种一目了然的、其局限性得以被部分廓清的新伦理时,人们无不欣喜不已。企业大张旗鼓的宣传,要么华而不实,要么与其行为相悖,这让我们如何去适从呢?当是与非的抉择沦为独立行事的专家们的职责时,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民主?当伦理学说只是作为遏制社会失信行为的一种手段时,人们又该怎样看待这个社会?明日的情形与其标榜的目标相去甚远,对伦理满腔热情的人对此应有所准备。

对寄托在伦理身上的期望应加以校正,而不是诋毁伦理。假如连对宽宏道德进行哲理上的鼓励都成为了没有道德目标的某种诅咒,那么终有一日不会再有人关心未来了。我们应当不偏不倚地对待道德的预言和对“自私”的推崇,在此,还应当为这些精致而实用的伦理举措辩护:它们不以纯目标为考量,而是关心其能否给人带来益处;没有空想,只有改良;没有一言九鼎的大师,只有现实的变通;没有指令,只有责任化。总之,“有益”的举措固然不错,但还应着眼于其能够改善人们境遇而非滋生华而不实的念头。宽宏或者利他主义明显地成为了道德的主要标准,但它们不能被视做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标准,除非为情势所迫。将道德仅仅看做绝对的、大公无私的个体行为,并认为那些政治、经济与行政手段“都”是以利益考虑为基础,从而在伦理层面上将它们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无视其彼此间的矛盾,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此情况下,应当为伦理的

精巧正言,因为它不要求人们放弃个人利益,而是要求人们节制;不要求公而忘私的英雄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理性的折中,寻求一些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并因人而异的“正确的方法”。我们都害怕新唯美主义及原教旨主义,但同时那种“自行其是”的经济发展却又时常陷入无助的境地并造成破坏。道德主义令人难以容忍,这是因为其漠视现实中的社会和个人,而新经济自由主义则祸及社会,使社会发展不平衡,使人疲于立法以应对现状,使未来受到拖累。为了一种可商榷的伦理,为了一种致力于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利润与劳工阶层利益之间、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之间、现在与将来之间、自由与团结之间实现平衡的伦理,我们绝对应该摒弃“信任伦理”及非道德主义的“无形之手”。之所以要为精巧的伦理辩护,是因为责任信仰已经失去社会的信任,因为社会公正需要效率,而要成就效率,便不能忽视人权、忽视人文,至少在新个人主义时代应是如此。责任的隐没并不是一种恶毒的诅咒,也不是一个美妙的诺言,但现实无疑加剧了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倾向。过时的责任、理想的破灭会催生出更多的对社会凝聚力的理性关注,催生出更多的协商意识、实用改良主义精神和更精妙且多元的人文主义,因此,除非停滞不前,一切仍可寄托于未来,难道不可以这样设想吗?

奉献的倡议苍白无力,对灿烂的历史前景的信念也日渐磨灭,因而,除了探索和等待这些精巧而恰当的方式产生

实用结果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倡导道德情操并不是无益的,因为它可引发产生慷慨行为,但它又不能成为一个高效、公正的制度长久运转的决定因素。高尚的情操固然可嘉,但也有人怀疑,高尚的情操是稍纵即逝的而不是恒定的,仅仅依靠它们,并不能保证社会沿着富足与公正的方向发展。从长期来看,除了依靠人的教育(认识的突破与知识的传播,强化个人的责任感,科学的、技术的、政治的与企业的智慧)别无他法。不可否认,智慧也可被用来做坏事以及实行自私的行为,这一般是个人层面的事,但长此以往,历史和集体的层面会不会也是如此呢?没有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的进步,我们的理念将仍然局限于空洞的形式,事实是否如此呢?以上并非倡导伦理信仰,也并非对人权与宽容进行颂扬,尽管其将最终克服仇外、不幸、环境破坏以及舆论偏颇。一切都需要高明的政策与企业、更多的责任教育及职业培训、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最好的办法便是加大投资,使得继续教育和知识能满足灵魂的迫切需求,满足人类智慧开发的迫切需求。

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因为普罗米修斯理性的堕落而否认其中的精华。道德理性所确定的方向,也只有现成的理性带领我们去实现它。除了人文主义价值观,没有其他的合理目的,除了依靠实践与理论智慧,也没有别的手段。后道德主义时代的目的在于企图复兴最高主义纲领所规定的责任,也并不是沉迷于伦理的重建,而是在于确认人权

的至上性、摆脱道德主义的羁绊、在企业中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内倡导精致的伦理举措,在于找到一些折中的解决方案,并通过与环境、与利益、与效率相结合来贯彻人文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赞美理性并不是说我们有塑造圣洁灵魂的野心,而是为了纠正世间的不公,为了创造一个多些责任、少些残酷的社会,但对此我们有何良策呢?人只有在特定时候才无好坏之分,而我们手中所有的牌只有科学、教育和实用的及实证的理性,我们不要求个人能够如何,只要求提高社会效率;不要求轰轰烈烈,但求人们能负起责任来;不求尽善尽美,但求能迅速遏制民主主义的贪欲和无耻。贪污、不公与卑劣永远不会消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巧妙应对,控制其蔓延,并加速建立起防范机制。如果说道德的历史发展有方向的话,那么其方向便是朝向捍卫人权、朝向果断采取措施以消除忍无可忍之事端,即用“审慎的”伦理或用“抓紧时间”的态度去解决弊端和解除人们的苦痛。但愿迟暮中的责任在未来仍有一线希望。